



刘海峰\*

[摘要] 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该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恢复高考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高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而且是维护稳定的“减压阀”。在高考恢复30年后的2007年，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 高考 招生 77级 恢复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各种媒体有关纪念高考30周年的报道和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呈现出一片热闹的景观。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除了高考，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30年就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这是因为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sup>1</sup>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 一、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终结持续十年的混乱状况，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要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总会恢复。但在1977年就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现在人们才了解到，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的前几天，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sup>2</sup>听完查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

\*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于是刘道玉向这位代表建议说，希望他明天就集中讲提出推倒“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sup>3</sup>而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对此的回忆却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为：“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sup>4</sup>两位参与者的回忆明显有出入。

不仅如此，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又有另一种说法：“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收回来，推迟几个月。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sup>5</sup>

历史才过去30年，许多当年参加会议的专家都还健在，对这次会议的重要细节已出现不少互相矛盾的回忆。可见历史需要进行复原。其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sup>6</sup>这句话已表明有恢复高考的含义。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sup>7</sup>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久拖不决。到后来，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sup>8</sup>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急转直下，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 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 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实际报考和录取时，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也有部分人还因政审被卡，但大部分地区是做到自由报考的，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庭通过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因此，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

回顾30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推动时代前进车轮，其个人与恢复高考，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还未否定、“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或更长几年。

## 二、空前绝后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考。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

经过浴火重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当时能步入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兴奋、好奇，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77年淳朴考风，考场绝少人想作弊。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sup>9</sup>当然，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高考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动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后一段等待的时间都还在延续。



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

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sup>10</sup>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sup>11</sup>这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

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题，但都是全省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

四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省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取具临时，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试外语者，再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

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原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结果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

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 三、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的影响，所以2002年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纪念，而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31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sup>12</sup>

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77年恢复高考，选拔了几十万人，却调动了几千万人。尽管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8%，也就是说570万考生中绝大多数当年没能考上大学，但高考恢复，使每一个人从此可以有做大学梦的权利和希望。在高考恢复20周年的1997年，多家中央报刊开展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活动，从应征文章看出，无论是当时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不少人虽经历过高考失败，但由于受过高考总复习的煎熬，养成了坚毅的个性，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sup>13</sup>。



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它坚韧有力的律动。”“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已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sup>14</sup>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者，或者有的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巨大差异、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体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此后，通过一次次高考，选拔出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经济起飞，穷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文革”不是结束于1976年，而是真正结束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宣告终止了“文革”的错误政策。恢复高考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全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在使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扭转“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典型代表，奏响了破除“两个估计”的陈旧思想枷锁、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序曲，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因此，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恢复高考给一批又一批勤奋努力、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高考的正面功能与积极作用是以考促学，即促进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考试制度的好处有不少，其中之一是求自己而不求他人。采用其他选才方式往往需求人，而求人最难，要看别人脸色，且成功与否操决于他人；考试则提供一个反求诸己的机会，能否成功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此考试选才能够促人向学、催人奋进。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都有数百万青年学生参加高考，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制度的促进下得以持续发展。恢复高考的最初两年，尽管试题不难，但有许多考生连最基本的题目都不会答。可是几年之后，试卷



难度提高不少,从答卷反映出考生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可见高考极大地调动了千百万青年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迅速恢复和提高,被“文革”摧残的文化教育很快得到复兴。<sup>15</sup>

#### 四、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就像体能测试或体育比赛可以测出一个人的体能和体质强弱一样,考试让所有应试者接受相同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的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或称“量才尺”。高考作为公平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恢复高考,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国家开始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此,知识青年的前途命运不再受制于他人,只要自己努力,便可能考上大学,进而施展自己的才干。经过11年的中断,1977年恢复高考,便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来临。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并不止是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更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由乱而治。人心向学,人心思治,学生稳定与社会上的知识青年稳定之后,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走上正轨,因此,恢复高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了考试崇拜,现在的高考崇拜和分数崇拜,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体现出人们对公平竞争的珍惜。在很多人心目中,高考是神圣的,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都知道完全取决于高考分数也有问题,但认为分数是硬的、难以作假的,而其他东西如平时成绩、表现、推荐信等等是软的、可能作假的。正如科举时代有这样的说法:“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sup>16</sup>现在许多人也将高考看成是中国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公平竞争制度,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是精神文明的一块绿洲。也正是因为大家高度关注高考的公平性,所以民众对高考期望值高、信任度高,但对出问题容忍度低,甚至几乎没有容忍度,要求高考不出现任何问题。因此高考作弊,被看成是“动了平民的最后一块奶酪”。每年的高考,有如社会风气的净化器,在全民关注、高度重视的氛围中,让大家一再感受公平竞争的神圣和可贵。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sup>17</sup>

作为“举国大考”,高考具有牵制教育目的、引导教育过程、评价教育结果等教育功能。<sup>18</sup>除了教育功能以外,高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够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而高考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因此高考在老百姓心目中难得的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许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通过考试,即使是带有不少缺点的考试,没有考上,人们服气。考生因一分之差落榜,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去怪政府怪社会,主要是怪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最多怪出身地不好。而且,当年考不上,总还保有下一次的机会,其失望不至于聚集到危险的程度。而采用其他选拔方式,若结果导致通过金钱、拉关系进入好学校,人们不服气,其不满针对的就是政府和社会,造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高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而且是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高考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关节点,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点,也是社会历来关注的热点甚至焦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动着很多学生、家长、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改革得不好,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不单单对教育的影响,还可能危害社会公平,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批评高考不公的人往往说每个考生起点不公,要所有考生参加相同的考试明显不公。这种观点的假设是,不用考试可以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实际上,这前提是不存在的。采用其他方式,只会更加有利于来自经济条件和社



会资本优越的家庭的考生。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招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一种少数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是高考这类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特征。时间固定、程序严密、操作严格、公平客观，使高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高考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高考这种制度很难凭个人好恶加以改变，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部分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五、功能强大的指挥棒

然而，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高考承负着越来越多的期待和负担，几乎变得“不能承受之重”。特别是近十年来，对高考制度的抨击此起彼伏，除个别人可能因为自己或子女没考好或者自己没有考上心目中的大学而对高考耿耿于怀以外，多数批评高考的人都是出于善意，希望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振兴中国的教育。但也有些言论非常激烈，曾经无比神圣的高考，在一些人眼中甚至变成可以随意抨击乃至唾骂的对象。

确实，高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高考又是功能强大的指挥棒，对中小学教育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高考存在某些局限性，因为一种统一的考试，它必然会诱发应试的顽症，造成学生学习时间长，体育锻炼少，造成一定程度的偏科，只重分数不重平时表现等等。虽然我们的文件中都有明文规定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在高考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是以“智”即高考的分数来决定一切。高考是有很多弊端，也对中学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目前还找不到更加科学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多年来，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高考还是在选拔大学新生中起主要作用。高校招生考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问题很多，改革难度也很大，不存在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招考办法。我们在各种选拔方式中，只能众利相权取其重者，众害相权取其轻者。

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有些理论上非常好的办法，例如考察平时表现和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但因为会走样失真，结果无法实行。高考是不太好，但没有高考将更不好。高考是有坏的方面，但至少可以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因此，多年来，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高考还是在选拔大学新生中起主要作用。

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一些人主张废科举以革除应试的弊端。甚至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sup>19</sup>。考试是一种公平尺度，高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升学提供公平竞争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只是将升学竞争从暗箱操作或关系博弈改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平进行罢了。

在所有教育改革中，高考改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教育领域有什么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那么高考必定是其中一项；如果要大家举出哪方面的教育改革难度最大，相信多数人还是会选高考。一部高考史，就是一部力图科学地选拔人才与追求公平之间相互矛盾、互相牵制的历史。高考制度是文化遗传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传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sup>20</sup>绝对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缺点但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但“物盈则亏，法久终弊，”在坚持高考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高考也必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康有为对科举改革的看法至今还值得重温：“凡



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sup>21</sup>只是高考改革难度很大，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文化传统、人事制度、教育与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sup>22</sup>

高考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选择职业的方式，以及未来生活的方式。对高考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30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制度，对一个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制度，对一个至今还在高校选才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制度，对一个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的制度，在高考恢复30年后的2007年，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30年前，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一英明的举措。但发展到今天，我也认为高考并非神圣不可动摇的制度，假如真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而代之，我也赞成用来替代高考。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美好而可行的选才方式？如果没有或找不到，我们就不要轻言废止高考，而要珍惜高考，正视高考，改进高考。

中国古代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有的事情过了30年前再谈起来，恍若隔世，但许多同年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却恍若昨日。恢复高考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 参考文献

- <sup>1</sup> 陈建功、周国平等：《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48页。
- <sup>2</sup>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5-26页。
- <sup>3</sup>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32-133页。
- <sup>4</sup> 查全性口述、张弘记录：《我发了言，邓小平拍了板》，《新京报》2007年3月27日。
- <sup>5</sup> 温元凯：《邓小平采纳我四分之三》，《新京报》2007年4月10日。
- <sup>6</sup>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102页。
- <sup>7</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67页。
- <sup>8</sup>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 <sup>9</sup> 杨威：《跨越时空的高考》，《新文化报》2007年4月6日。
- <sup>10</sup>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2页。
- <sup>11</sup> 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57-258页。
- <sup>12</sup> 刘海峰：《而立之年论高考》，《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
- <sup>13</sup>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中国教育报》编辑部：《我的高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 <sup>14</sup> 阎阳生：《两代人的高考故事》，《生活时报》2005年11月4日。
- <sup>15</sup> 刘海峰：《以考促学：高等教育考试的功能与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sup>16</sup>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选举·科场》。
- <sup>17</sup> 武皓：《公正——我与高考》，《中国考试》1997年第5期。
- <sup>18</sup> 郑若玲：《论高考的教育功能》，《教育导刊》2005年第1期。
- <sup>19</sup> 《宋史》卷155《选举志》。
- <sup>20</sup> 《清史稿》卷108《选举志》。
- <sup>21</sup>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08页。
- <sup>22</sup>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